

文学及语言

# 1907、1908年间的 “万国新语论争”

黄晓蕾

**【提要】**1907至1908年间,旅法中国留学生于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以社会进化论为基调,以语言工具论为依据,宣传语言文字的进化和革命,认为汉文相较西文、万国新语是落后文字,理应被废除,中国文字应改用西文(或万国新语)。此论一出,即引起国内知识界关注,以章炳麟为代表的国粹派在《民报》、《国粹》报刊上发表数篇驳文,反对废除汉文,反对中国使用万国新语。

**【关键词】**吴稚晖 章炳麟 汉文汉字 万国新语

**【中图分类号】**H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5-0101-05

20世纪初,清廷大厦将倾,民间思潮涌动,中国近代语言文字运动行至今与古、中与西的历史路口,朝野上下、社会各界对语言文字问题日渐关注。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依次登场,由民间各种拼音方案的提出,到精英知识分子的语文论争,再到政府提出新学制章程,风云涌动的清末语言文字运动,为现代中国语言变革登上历史舞台拉开序幕。在这场涉及多个层面的社会运动中,相对于切音字运动启发民智、根植方言并直接参与教育实践的民间立场,清末知识精英更加注重在形而上的层面讨论汉语、汉字乃至整个汉文化的前途和未来。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激荡中,各种语言文字思潮纷纷出现,彼此对立,激烈论争,直接影响了即将到来民国时期的语言观念和语文运动,吴稚晖<sup>①</sup>和章炳麟<sup>②</sup>关于是否废除汉文、是否使用万国新语的论争即颇受瞩目。<sup>③</sup>

1907年,旅法中国留学生于巴黎创办《新

世纪》周刊。1907至1908年间,《新世纪》周刊以社会进化论为基调,以语言工具论为依据,宣传语言文字进化和革命,认为汉文相较西文、万国新语而言是落后文字,理应被废除,中国文字应改用西文(或万国新语)。此论一出,即引起国内知识界关注,以章炳麟为代表的国粹

① 吴稚晖(1865~1953),1890年入江阴南菁书院,1894年入苏州紫阳书院,曾科考中举。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后出版《新世纪》周刊,鼓吹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② 章炳麟(1869~1936),1891年入杭州诂经精舍,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学术文章。

③ 清末知识界有两次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论争,其一是吴稚晖(以及《新世纪》周刊的其他相关文章)、章炳麟之间关于废除汉语、使用万国新语的争论,其二是章士钊引发的关于译名的讨论。两次论争均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一时俊杰多有参与,两次思潮在民国时期均有继承和发展,并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语言文字观念和态度。

派在《民报》、《国粹》报刊上发表数篇驳文，反对废除汉文，反对使用万国新语。

## 一、1907至1908年间《新世纪》周刊关于中国应废除汉文、使用西文或万国新语的一系列言论

### (一)“中国文字当废”观点的提出

在《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一——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一文中，作者首先以文字的工具性（“便利”）为标准判断文字的优劣，认为象形、表意之字较合声之字为劣，根据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提出以西文或万国文代替汉字（文字）或中文（汉语）的系列语言文字主张。<sup>①</sup>作者其次论及文字与印刷的关系，将印刷由落后至先进分为人工镂刻、活字版和以机铸字三类，而东文（汉字）使用较为落后的印刷方式，西文使用较为先进的印刷方式，因此作为东文代表的支那文字（汉字）自然应当废除。<sup>②</sup>

此文是《新世纪》周刊早期的力作，在多个社会层面提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语言亦是其中之一，作者从文字本身的理论分析和物质技术的现实更替两个角度出发，详细分析汉字当废的语言和社会根据。

### (二)吴稚晖主持万国新语、中国新语讨论

1908年，《新世纪》周刊开始频频介绍和宣传万国新语，语言文字讨论由“中国文字当废”阶段进入“使用万国新语”、“编制中国新语”阶段。

1908年《新世纪》周刊第34、35、36号《万国新语之进步》连载文章详述万国新语作为人工语言的五大特色，力陈万国新语良于英文或他国文，尤胜中国文字，认为中国若欲摆脱落后状态必须废除中国文字直接使用万国新语。然而，“废除中国现有文字直接使用万国新语”作为一种较为极端的语言文字观念，即使是《新世纪》周刊内部亦有不同看法，于是出现了相对较为温和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编造中国新语”。《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虽然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万国新语“最佳最易”，但“万国新语通行全国”的主张“持论太

高”，反而不利实行，不如先行编造“能逐字翻译万国新语”的“中国新语”为将来之准备。<sup>③</sup>作者同时提出编造中国新语的五条凡例：1. 以“们”、“的”、“们的”、“然”、“上”等翻译万国接头接尾等词；2. 只用“平画、直竖、斜弦、圆点”四种笔画使笔画简易；3. 凡万国新语中有一辞，中国新语中必定以一相当之译辞，且只定一辞，不可多于一辞；4. 用左移横行法；5. 采用欧文句读法。

燃（吴稚晖）以“本报附注”的形式对五条凡例细加分析，逐一评说。吴稚晖认为作者关于“的”、“然”等接头接尾词提法对于界定形容词、副词甚为切要。<sup>④</sup>关于简易笔画，吴稚晖的观点异于作者。燃认为暂时改良汉字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仿效日本，限制字数，范围是“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至于“较深学理”和“繁琐事务”可属入万国新语；其二是以草书为手写体即可，原因在于就印刷而言无关乎笔画多少，就辨认而言简易笔画则易生混淆。<sup>⑤</sup>吴稚晖对作者编字典、创月报的提议亦

①（一）以合声之字代替象形、表意之字即为文字革命；（二）以西文（欧洲文字）代替支那文（汉字）为文字进化；（三）中国字以西母合成和直用西文原字（汉语罗马化）为存留语言、革命文字（中国的合声字母虽较汉字进化但仍然缺点甚多）；（四）以西文或万国文代中文则为语言文字革命。

②“经以上比较而后可断言曰，机器愈良，支那文愈不能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必先废劣字。此支那文字必须革命间接之原因也。”参见《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一——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新世纪》周刊1907年第20号。

③“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一旦欲使万国新语通行全国，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犹远。因时合势，期于可行，其在介通现有文字及万国新语，而预为通行万国新语地乎。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即此意也。”参见《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世纪》周刊1908年第40号。

④“于形容词加‘的’，于副词加‘然’或‘上’，皆甚切要。在彼从成语或名词等转变而来之形容词，或副词，尤宜加增‘的’‘然’等字，以清眉目。”（同上）

⑤“中国文字之迟早必废，本稿已言之矣。故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采用二法：（一）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二）即手写之字，皆用草书。无论函牍证凭，凡手写者，无不于行草，有如西国通行之法。”（同上）

颇为认同，并加之成立协会一项。<sup>①</sup> 吴稚晖最后格外提出“划一声音”一条，认为语言是“声音之事”，“中国新语”为“合各省之语言代表以一种之语言”。

自《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一文刊登后，《新世纪》周刊收到论述万国（中国）新语的投稿日渐增多，《新世纪》周刊连续刊登《新语问题之杂答》（燃，1908年，44号）和《续新语问题之杂答》（同上，45号）两篇文章，吴稚晖开始主持《新世纪》周刊的新语讨论。

《新语问题之杂答》针对《编造中国新语》续文中提出的废除中国文字使用新文字三种方法，即“采用一种欧文”，“用罗马字母，反切中国语音”，“用万国新语”，认为“画一声音”为中文的“一大烦难”，因此“用罗马字母反切中国语音”不如直接“用万国新语”。吴稚晖就该段加以评论，以日本假名为例强调使用西洋字母对于世界（尤其中国）的文明进步大有裨益，着力讨论使用万国新语的必然性。<sup>②</sup> 吴稚晖又由新语会会员和笃信子关于“编造中国新语，徒生枝节，其结果不外多造一难题”说开去，分（甲）出版物（“编译新语华文对照之独修读本文法字典”）、（乙）社会宣传（“急求联合会”）、（丙）学校教育（“列于学校科目”）和（丁）普及对象四个层面讨论推行万国新语的具体办法，其中第三条特别值得关注。吴稚晖认为在小学校几类教材中，“制造局派所译述之国文格致课艺”和“多属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之间以后者为佳，而在“多属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和“一种西洋文”之间又宜取“西洋文”，学习外国文则是学习“万国新语”的舆论准备，因此“万国新语”是学校教育可以渐次达到的最终目标。

语文改革研究界对于20世纪初《新世纪》周刊系列语文观念的讨论并不多，其梳理分析多见于社会思潮、文化制度的研究文章，重点探讨其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念和世界大同的社会构想。语文改革研究界提及语文观念时也多以万国新语的提出一笔带过，但是细究其文献材料和系列观点就会发现，《新世纪》周刊提出的语文观念是一个系列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层

面的内容：（一）以废除汉文、使用万国新语为最高语文革命目标；（二）当下的任务是编造中国新语，并提出五条凡例；（三）提出推行万国新语的四条实施办法。《新世纪》周刊因为提出废除汉文、使用万国新语这一极端语文观念导致知识界一片哗然，以章炳麟为代表的国内知识精英对此观念痛加驳斥，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中，《新世纪》周刊提出的其他语文观念以及培养的语文改革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其实，《新世纪》周刊的系列理论和培养的语文改革人物远非我们认为那样无关痛痒，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对民国时期产生重要影响：上述系列语文理论的第二条（编造中国新语及五条凡例）对于国语会、《新青年》时期胡适、钱玄同等文字改革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而第三条中的实施办法则奠定了吴稚晖这样一位语文改革干将此后着力于制度层面、实施层面的语文改革风格。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客观细致地来看待20世纪初的那个语文改革理论。

## 二、1908年章炳麟、吴稚晖关于废除汉文、使用万国新语的往来辩驳

### （一）章炳麟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

1908年，章炳麟于《民报》（1908年第21期）发表长文《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驳文虽以《新世纪》周刊提出的“使用万国新语”破题，但是章炳麟认为《新世纪》语言文字言论的核心观念首先是汉文当废，而汉文又正是以章炳麟为代表的国粹派所固守的理论支点之一，因此章炳麟首先驳斥的是《新世纪》所谓“汉文既‘未开化’又‘无准则’”。

① “同人于前行君编字典创月报等之盛举，皆热诚赞同，并望同志协会，早日成立。”（同上）

② “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故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新语问题之杂答》）

章氏首先驳斥汉文“未开化”。章氏认为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相关，不可人为改变，万国新语是根植于欧洲的语言，与汉语“既远人情”，“亦自抵牾甚矣”。章氏以马来、蒙古的文化发达程度和俄国、日本的识字率为例说明合声字较象形字先进的论点并不成立，并提出识字率的高低在于强迫教育，与文字形式无涉。章氏其次驳斥汉语“无准则”。章氏认为汉语词汇的古今差异不大，语音的嬗变更是自有其规律，与日本汉字、假名相杂的文字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章氏认为汉语各地方言虽有差异，但是其底层却大致相同，因此汉语各方言间的差异远远小于汉语和万国新语之间的差异；同时提出如果以方便使用为目的，可以用官音作为标准，但是如果以审定语音为目的，则应该以江陵武昌语音为标准。章氏再论《新世纪》周刊“尽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的谬误在于两点：其一，汉土名物与欧洲相差甚大，汉语与欧洲语言（包括以此为根基的万国新语）无法相互转变；且章氏提出若以中外交通计，使用外国语即可，若以“学之近文”计，则更是非汉文不可，上述两种情况均无需万国新语。其二，汉语语音繁复，与欧洲语言（包括以此为根基的万国新语）的语言体系完全不同，使用后的语音体系无法表达汉语；同时，汉字象形与汉语方言复杂相关，一旦使用合声则大大降低文字的使用效果。章氏最后提出辅助汉字书写、汉字学习的具体方法：其一，兼知章草便于书写，“欲使速于疏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其二，略知小篆便于识字，“若欲易于察识，则当略知小篆，稍见本原”。章氏认为当下各种辅助汉字读音的简字、切音字方案，不仅本身谬误颇多，更有甚者认为切音成文可以替代汉字，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同音而殊训者又无以为别”，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为当世所非而流传不广。章氏最后在原有纽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音表，并就利用该音表学习汉字的步骤详加解说。

章炳麟又于《民报》1908年第24期发表《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再次驳斥《新世纪》周刊的语言文字观念。

章炳麟认为万国新语是源于欧洲的人造语言，是欧洲人的“欧洲新语”，对亚洲人而言则是“外交新语”。章炳麟从亚洲的面积、人口、语言源流（学术孳乳）、名号、术语和恒言、语言文字与科学的界定、印刷、文明程度、语言文字与民族的关系、文学与历史、野蛮与顽固、以及种姓与科学等多个角度分别论述亚洲语言与万国新语不相容，并提出亚洲即使自编“邦交新语”也只是便于交通，万不可自废其本国文字。章氏又解释自定纽韵文之所以使用篆籀的形式原因在于笺注正文时不易混淆，同时指出劳乃宣的简字若为帮助识字的反语，且上下皆有所准，则亦可称道，若试图替代汉字，则万万不可。章炳麟最后于按文中以正音传统、语言类型的不同论证中国不可仿效西方将首都音为国之正音，而应以武昌音为基础并博采各处方言音为正音，且在词汇方面亦应杂采殊方。

章炳麟的小学大成毋庸置疑，但章氏对于现代语文改革的影响却少人提及，其中固然有章氏自身一贯的泥古倾向，但语文改革研究界对其重视不足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章氏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对清末民初的语文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其一是清末驳斥万国新语和坚持汉文不可废，其二是自订纽韵文成为民初注音字母的原型。细加分析不难看出章氏影响的是现代中国文字改革中的两个基本观念——“用不用汉字”和“用什么样的汉字”，而这正是一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一直进行的主要任务。如果说，吴稚晖是现代语文改革制度和实施层面中绕不开的人物，那么章炳麟对于现代语文改革观念和技术层面的影响足可以与之比肩。

## （二）吴稚晖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废除汉文议（按语）》

吴稚晖（燃料）于《新世纪》周刊1908年第57期发表《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回应章炳麟对万国新语提出的批驳。

吴氏首先认为语言既然只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工具，那么就必须进行人工改良。同时，吴氏指出采用万国新语是最高语言理想，但却非当下可以采取的语言措施，当下只能“大概迂拙之进行”。包括：（一）声音划一，适

宜音字。吴氏肯定了章氏的切音方案是当下最好的，但是对其使用篆籀的形式不以为然，认为简单的笔画即可；同时提出最重要的具体推行措施是利用切音方案先刊行字典并用之小学读本、幼稚园读本和通俗书报。（二）入高等学校和大学校必须精通一到两种西文。（三）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教授万国新语。吴氏再以印刷为例说明中国文字与万国新语的优劣。吴氏最后回应章氏认为万国新语不足以名中国名物的观点。

苏格兰于《新世纪》周刊1908年第69期发表《废除汉文议》，吴稚晖在该文的按语中论述文学、名学以及学问和事业中使用的汉文皆应废除。关于文学上的汉语，吴氏认为：“故自今以后，如欲扩大文学之范围，先当废除代表单纯旧种姓之文字，（旧种姓者，本于文字外充溢于精神）而后自由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以世界各种之良种姓，配合于我旧种姓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学，以造世界之新种姓”。关于名学上的汉语，吴氏首先认为，将汉语理解为国粹的思想，其谬误之处在于汉语是野蛮国学说中的而非世界学说中的精粹；其次吴氏认为国文是国家根本的思想亦不可取，因为在理论上一国之国文并非是其国家、民族的表征，在实践上清代以来的八股文章则只是一种失败的国家教育；再次，就一般教育而言，需要了解在古代事物法制本就有限，且可以通过编辑、翻译的方式加以学习，与汉字的有无不甚相关；

最后，认为汉语与爱国相关是幼稚的；认为汉语和交流相关是随意就现状述事实。吴氏又认为为学问或事业上的汉语最当废除。

吴稚晖是民国时期一位甚为复杂且较难评判的历史人物：在政治上——从前清举人到无政府主义者再到国民党元老，在语文上——则从豆芽字母到万国新语再到注音字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的观念主张。《新世纪》周刊时期的吴稚晖当然是主张万国新语的，所以在《废除汉文议（按语）》中极尽驳斥之能事，认为文学、名学以及学问和事业中使用的汉文皆应废除，但吴氏又是万国新语派中较为温和且倡导实践的一派，因此在《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一文中，固然将万国新语视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最高目标，却认为当下任务是语音统一、选定音字（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章炳麟的纽韵文），提出利用切音方案出版字典、教科书和通俗书报等主张。正是由于吴稚晖相对温和、富于实践性的语文观念以及此后日广的仕途，因此无论是读音统一会还是国语统一筹备会时期，吴稚晖均在制度和实施层面极大地推动了民国时期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行，或者说，吴稚晖是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人物。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The Debates of Esperanto During 1907 and 1908

Huang Xiaolei

**Abstract:** In years of 1907 and 1908, some Chinese students in Paris established *LA NO-VAJ TEMPOJ*. They disseminated the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 according to social evolutionism and language instrument theory. They also considered Chinese Characters as backward characters and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view caused concerns from domestic intellectual circles at once. Guocui represented by Zhang Binglin published theses in *Guocui* and *Minbao*. Guocui opposed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using Esperanto.

**Keywords:** Wu Zhihui; Zhang Bingl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Esperanto